

# 二十一世紀評論

## 知青與當代中國

### 「文革一代」上台執政： 差異何在？

蕭鳴喲

#### 一 中國精英政治中的代際因素

在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新一屆領導班子開始執掌中國的政治機構，他們在未來決定中國這一強大國家的行為時將發揮決定性作用。隨着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與日俱增，觀察家想知道的是，對中國以及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未來而言，新一屆領導班子上台可能意味着甚麼。

當然，沒有人能夠預知未來。社會科學家也未必有能力預測一個領導集體的未來行為和決策，尤其是在一個像中國這樣封閉的政治體制下。但通過建立一個框架做進一步觀察和分析，社會科學家可以嘗試捉摸到可能發生的情況，甚至是有望發生的情況。想要確切回答新一屆領導集體的產生會對中國整體政治取向產生何種影響，筆者認為有兩組問題必須首先得到解答：

- 一、新一代領導人的主要特點是甚麼？更重要的是，這裏所說的「代」這一概念是否和社會科學中所定義的完全相同？
- 二、代際因素是否可以對像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政黨的領導人的行為產生影響？如果可以，那麼我們又能從這一代主要特徵已經被確定的領導人身上期望些甚麼？

筆者曾在2006年《社會研究》(Social Research) 雜誌的一期特刊上發表一篇論文，首次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探討<sup>①</sup>。當時促使筆者撰文的部分原因，是由於讀到了李成在200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國領導人：新一代》(China's Leaders: The New

想要確切回答新一屆領導集體的產生會對中國整體政治取向產生何種影響，有兩組問題必須首先得到解答：一、新一代領導人的主要特點是甚麼？二、代際因素是否可以對像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政黨的領導人的行為產生影響？

Generation) ②。雖然李成之作為我們了解中國政治精英做出了重要貢獻，但筆者對他的分析和預測存有異議。筆者不認為胡錦濤和溫家寶等領導人應該被算作「文革一代」的成員，而對李成認為以胡為首的領導集體會實施重大政治改革的樂觀看法，也強烈質疑。

事實已經證明，筆者的強烈質疑不無道理。不過，這並不意味着胡錦濤之所以沒有實施李成所設想的一系列改革，是因為李成在總結上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代際特徵時犯下了筆者所認為的錯誤（當然這可能是原因之一）。筆者仍然同意李成的看法，即和前一代人相比，「文革一代」在政治上可能沒有那麼保守和正統。此外，由於中共十八大以來，「文革一代」的很多人佔據了相當大部分的高層職位，筆者相信這可能會對中國政治產生影響。但是必須非常清楚地認識到，在探討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並非走在堅實且方向明確的道路上。這正是本文試圖以謹慎和盡可能客觀的方式回答此前提出的兩組問題的原因。

## 二 在毛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 「文革一代」、「失落的一代」

「文革一代」，或稱「失落的一代」，在世界歷史上具有獨特的特徵：他們是一個人以造物主的意願締造的產物——這個人就是毛澤東，他想要創造整整一代「革命接班人」。這代人要完全投入到社會主義事業以及毛澤東理念的實現中去。儘管毛的努力最終完全失敗，但卻給經歷過這場運動的年輕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烙印，以至於形成了非常特別且尤其具有自我意識的一代人③。這也正是這一代人可以被視為毛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的原因。

意識到自己屬於某一代人的現象並不局限於這一特定群體，在中國這一現象比大多數國家更為普遍。在中國有關代際現象研究的文章和書籍也特別多，中國以外的觀察家和學者也經常探討這一問題，但用於界定不同代際的標準並不總是清晰且根據充分的。

在《社會研究》上的那篇論文中，筆者詳細介紹了「代際」的理論定義④。這一定義主要基於社會學家曼海姆 (Karl Mannheim) 的名著〈代際的問題〉（“Das Problem der Generationen”）⑤。然後，筆者開始在這一理論基礎上對「文革一代」進行定義。當然，這並不僅僅是機械地運用這一理論，而主要是基於筆者多年來對文化大革命以及知青運動及其後果的實證研究。

粗略地講，「文革一代」在性格形成時期受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時期（即紅衛兵時期）以及／或隨後推出的「教育革命」政策的影響。在「教育革命」這一口號的呼籲下，正統的學術學習受到輕視，而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參與政治鬥爭和體力勞動則受到稱讚。知識和職業之間的聯繫不再那麼密切，城鎮中學畢業生只有在至少參加過兩年體力勞動之後才有可能進入大學學習，且能否被錄取主要取決於政治標準。「上山下鄉」是任何一個城市年輕人可能面臨的命運。這

「文革一代」，或稱「失落的一代」，在世界歷史上具有獨特的特徵：他們是一個人以造物主的意願締造的產物——這個人就是毛澤東，他想要創造整整一代「革命接班人」。這代人要完全投入到社會主義事業以及毛澤東理念的實現中去。

一運動不僅對實際到農村去的知青產生了深刻影響，也對他們的兄弟姐妹和父母產生了重大影響。

由於「教育革命」政策的基本退出發生在1978年，因此我們考察「文革一代」的時期不該僅僅包括文革十年(1966-1976)，還應將1977年納入在內。事實上，由於華國鋒決定追隨毛澤東推行的的大部分政策，1977年是知青下鄉數量很高的一年，這一年甚至是知青在農村的數量最多的一年<sup>⑥</sup>。還有一些知青是在1978至1980年間上山下鄉，不過數量不多，且情況各異。事實上，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徵是幾乎所有知青返回城市。此外，中國在1977年末恢復了高考，這算是違背「教育革命」政策的首個重要舉措。恢復高考從根本上改變了剛剛成為高三畢業生的一代人的教育和就業機會。

1977和1978年的高考放寬了年齡限制，為的是給「失落的一代」一個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許多觀察家已經指出這些年齡較大的學生表現出非常獨特的品質<sup>⑦</sup>。這一群體中日後成為知名知識份子的比例特別高。他們表現出一種屬於「文革一代」的強烈意識。

我們可以認為，「文革一代」包括了所有大約在1947至1960年出生的城市人群。文革開始時上高三的那批人普遍是在1947年出生的，而在1977年否定「教育革命」<sup>⑧</sup>政策前上高三的人則普遍是在1960年出生的。在界定代際起止年限時總是或多或少會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sup>⑨</sup>，這一群體也不例外。我們可以排除那些在1966年已經上大學或職業中專學校的學生，因為他們的命運並沒有受到文革的持續影響，畢業後迅速從政府那裏得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

就我們所考慮的這一年齡段的人而言，「代際境遇」對每個人造成的影響以及其對「代際」的意識和看法並不完全相同。對於1966年就讀初中或高中的學生(俗稱「老三屆」<sup>⑩</sup>)，以及在1968至1977年被送到農村的知青來說(這一代人的核心就是老三屆；他們先是成為紅衛兵，然後成為知青)，他們的代際歸屬感尤為強烈。

如果拉長時間範圍，我們必須承認那些在老三屆之後、但又在1978年之前高中畢業的中國城市青年群體有一定的特殊性。由於紅衛兵運動開始時他們還在上小學，因此他們無法參加這一運動。但由於推行「教育革命」，他們的學校教育被中斷，無法直接升入大學，其中有大量人被迫到農村去成為知青。1970到1972年之間被送到農村去的知青數量有所下降。1973年(這一年知青數量再次上升)之後，由於當時全國物質條件普遍有所改善，知青主要被送往其所在城鎮的農村郊區。因此，大約在1954至1960年間出生的這一批人所遭遇的經歷不如老三屆那樣獨特。但二者還是有類似的方面，且前者中的大多數人受到老三屆的影響，尤其是因為他們中很多人的大哥大姐都是老三屆。和老三屆一樣，他們對毛主義的理想也不再抱有希望，並且對自己黯淡的職業前景心存不滿。在政治上，他們則遭受文革第一階段就已經爆發的「兩條路線鬥爭」的嚴重影響。他們的代際境遇，以及他們在1970年代的實際處境和他們的兄長基本一致。這也正是這些「小知青」應該被算作「文革一代」的另一個且最後一個群體的原因。由於這一群體的經歷並不那麼具有戲劇性，其群體成員的代際歸屬感因此沒有那麼強烈。

1977和1978年的高考放寬了年齡限制，為的是給「失落的一代」一個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許多觀察家已經指出這些年齡較大的學生表現出非常獨特的品質。這一群體中日後成為知名知識份子的比例特別高。他們表現出一種屬於「文革一代」的強烈意識。

### 三 「文革一代」和「第四代領導集體」

我們在定義「文革一代」時所做出的空間和時間限制應該多少能幫助我們理解當代中國政治領導層的代際歸屬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不幸的是，鄧小平在1989年給出了一個官方定義。此後，由於中國共產黨宣傳部門所擁有的「強大威力」，這個定義被不斷重複和發展。按照鄧的定義，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理，他本人則是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理。鄧是在1989年6月16日與其他高層領導的一次會面上提出這一定義的，當時距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沒多久。鄧這番講話的用意是清楚的，即向他的同僚灌輸一種理念：一個領導集體需要一個核心理——江澤民應該受到尊重，並被尊為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理，因為他本人年齡太大，無法繼續執掌最高權力<sup>①</sup>。

應該清楚指出的是，鄧小平所提到的「代」和社會科學中的「代際」概念毫無關係，僅僅是指中國共產黨一代又一代的「領導集體」。這裏的「領導集體」實際上相當於中央政治局。此外，在鄧看來，只有那些擁有一個強大而穩定「核心理」（即最高領導者）的領導集體才能算作一代。因此，在毛於1935年遵義會議上執掌最高權力之前的所有中共高層領導人，以及華國鋒、胡耀邦和趙紫陽等人都被鄧忽略。事實上，鄧在解釋中共黨史時表明了他對權力的一種類似「帝制」的理解。這一點他和毛的理解一樣。他所用到的「代」這個字和適用於王朝的「時代」類似。江澤民後來不得不接受這樣的事實，即胡錦濤成為「第四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理」，因為這也是由鄧確定的。

今天，這種對前四代領導集體的劃分已經變成了不可質疑的教條。這種劃分方法存在的主要問題並非其在歷史上存在不準確的地方，而是這一方法經後人發展，試圖將其作為普遍劃分中國政治代際的基礎。後人這麼做混淆了鄧小平所用的「代」和這個詞在社會科學中所具有的含義。他們在使用這種對前四代領導人的劃分方法時，就好像這一概念恰好同真正的「代際」概念相同。這種混淆只會違背歷史的準確性以及有關「代際」的社會科學理論。在界定同屬「一代」的領導集體（這是鄧的真實意圖）時，我們往往會排除這樣一種可能，即兩代領導人同屬一代領導集體，或前後兩任最高領導人同屬一代理人。但這些都是很常見的現象。鄧這種劃分幾代領導集體的作法還存在別的問題，包括鄧本人的代際歸屬問題。按照他自己的定義，他屬於第二代領導集體；但從歷史和代際理論看，他又算是第一代領導人。鄧屬於參加成立中國共產黨全部過程的那一代領導人，只不過當時他年紀比較小。比方說，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周恩來寫文章，他自己油印左派小報。所以，筆者認為可以說鄧是這一代中共創立者的「小弟弟」，但他不屬於他們的下一代。

這種混淆「代際」和「領導集體」的理論引起了另一個問題，即和第四代領導人有關聯的重大歷史事件是甚麼。李成認為第四代領導集體應該被界定為「文革一代」<sup>②</sup>。但從之前所論述的情況看，應該明確的是在2002年掌舵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不屬於「文革一代」，他們正好趕上了前一代人的「末班車」，可以被稱

鄧小平在解釋中共黨史時表明了他對權力的一種類似「帝制」的理解。這一點他和毛的理解一樣。他所用到的「代」這個字和適用於王朝的「時代」類似。江澤民後來不得不接受這樣的事實，即胡錦濤成為「第四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理」，因為這也是由鄧確定的。

作「社會主義一代」或「正統一代」。十六屆政治局所有常委的性格形成時期都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前。他們遵從的是當時在正統共產黨國家謀求政治成功的「黃金路線」：成為一所工科學校的畢業生。1966年，這屆政治局常委都從大學畢業了，正是年輕有為的國家幹部。作為第四代領導集體最高領導人，1942年出生的胡錦濤在1965年已經從中國最負盛名的一所工科高等院校清華大學畢業，並留校任政治輔導員。在十六屆政治局所有常委以及其他屬於「社會主義一代」的中國高層領導人中，胡錦濤的經歷具有代表性。應該指出的是，第四代領導集體和江澤民所代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之間存在明顯相似的地方：他們都是工程師<sup>③</sup>。這表明，兩代領導集體都受過正統的社會主義訓練。

我們花了一些篇幅來解釋，就政治領導人而言，哪些人不能算是「文革一代」。現在我們試圖看看，哪些領導人算是「文革一代」？「文革一代」的政治份量有多大？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又能從這一代人身上期望些甚麼？

#### 四 「文革一代」和中國高層政治

即使中共十八大產生的新一屆領導集體包含很多「文革一代」成員，但這一集體仍然包含了幾代人。從中可以看出我們經常聽到的一句話——知青執政——所存在的局限。不過，職位最高的三位領導人都當過知青。

在2007年召開的中共十七大上，「文革一代」有2名成員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習近平和李克強），還有6人進入有25名委員的政治局。所以在當時中國就有一個由兩代人構成的領導集體：掌舵的是「社會主義一代」，但也有「文革一代」的成員。由於歲數較大的「社會主義一代」領導人受年齡限制而必須離任，「文革一代」如今已成為高層領導中的重要力量。

但是，即使中共十八大產生的新一屆領導集體包含很多「文革一代」成員，但這一集體仍然包含了幾代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仍有從年齡上講算是上一代人的領導人，比如1945年出生的俞正聲，甚至還包括張高麗和劉雲山。後兩人雖然分別出生於1946和1947年，但1966年文革開始時他們已經分別在廈門大學和集寧師範學校學習，這有助於他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成為國家基層幹部。因此，這三人也不能算是「文革一代」的成員。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中，有佔多數的4人屬於「文革一代」（全部做過上山下鄉的知青），另外3人屬上一代。在政治局其餘的18名委員中，也有佔多數的12人屬於「文革一代」，但與常委的情況差異比較大，因為其中只有3人是知青<sup>④</sup>。這就意味着在政治局25名委員中，當過知青的只有7人，佔比僅為28%。從中可以看出我們經常聽到的一句話——知青執政——所存在的局限。而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205名委員中，65人有過知青經歷，佔比達31.7%<sup>⑤</sup>。當然，政治局常委的權力大於政治局委員。我們也不要忘了，職位最高的三位領導人都當過知青<sup>⑥</sup>。

和政治局常委一樣，在十八位政治局委員中，也有幾位屬於上一代成員，比如1945年出生的劉延東就是清華工程師的典型代表，而1946年出生的馬凱在1966年就已經是北京四中（北京市重點中學）的教員。

在談到「文革一代」的成員時，應該指出的是，他們出任中央或省級最高領導職務時年齡較大。這是因為他們的青年時代被耽誤了。「失落的一代」也被稱為「被耽誤了的一代」，因為鬧革命和參加體力勞動耽誤了他們學習和參加專業工作的時間。但有一個群體最能「挽回」被耽誤的時間：高層領導的子女。在因文革而遭遇了幾年困難之後，這一群體挽回了自己的地位和特權。在1970年代之初中國大學重新恢復招生之際，這批1980年代逐漸為人所了解的「太子黨」在非常激烈的政治競爭中有最好的機會成為工農兵大學生，因此在1977至1978年恢復的高考中，他們也能以較好的條件進行備考。此外，在1980年代初，那些在文革中倖存下來的老一代領導人決定加快培養一批被稱作「第三梯隊」的未來接班人時，太子黨顯然受到青睞，能被迅速提拔至政治崗位上。因此，得益於這種如同坐直升機般的升遷提拔，部分太子黨成員得以挽回被耽誤的時間並爬至最高領導層。這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習近平、薄熙來、王岐山和李源潮。

但總的來說，「文革一代」領導人執掌政壇的時間可能會比較短暫，尤其是在新一代領導人目前已經爬到最高領導層的情況下。筆者將後者稱作「改革一代」。在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後，這一代人能夠獲得良好的教育和職業發展機會。在十八屆政治局委員中，均出生於1963年的胡春華和孫政才兩人就屬於「改革一代」。這意味着新一屆領導班子由顯然不同的三代人構成。

但是，構成新一代領導集體的主體還是「文革一代」，下面就讓我們來看看其中的政治明星，並藉此了解他們的個人經歷。首先應該指出的是，雖然「文革一代」中的大多數人嚴重缺乏教育機會，但和前任領導人相比，那些爬到政壇最高領導層的人還是接受了更高層次的教育（這主要是因為他們能夠通過1977或1978年的高考，或是因為他們在工作之餘有很強的動機進行自學）。新一代領導集體所學專業和前一代領導人不同，這一點顯得格外醒目。江澤民和胡錦濤那一代領導人幾乎全是工科畢業，而「文革一代」領導人則呈現出文憑多樣化的趨勢，其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其中包括經濟學和法學。

雖然「文革一代」中的大多數人嚴重缺乏教育機會，但和前任領導人相比，那些爬到政壇最高領導層的人還是接受了更高層次的教育。江澤民和胡錦濤那一代領導人幾乎全是工科畢業，而「文革一代」領導人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和法學。

## 五 來自「失落的一代」的政治明星

「文革一代」中，薄熙來曾經被視為最有前途的政治明星之一。雖然他現在是一顆隕落的星，但依然值得介紹。許多人仍然認為他是這一代人的一個典型代表，但在筆者看來這是錯誤的。在「文革一代」中，薄的經歷非常不具典型性，因為他既沒有上山下鄉，也沒有到工廠工作或參軍。相反，在1968年紅衛兵運動偃旗息鼓之際，薄卻進了監獄，度過了五年的牢獄生活<sup>①</sup>。1972年出獄後，薄在一家工廠工作，並在1977年獲北京大學歷史系錄取。他是薄一波的兒子。在1980年代初期，薄一波是積極主張加快提拔太子黨的領導人之一。薄熙來的領導風格和「文革一代」的其他領導人迥然不同，其中具有個人魅力的元素，這種個人魅力可能注定有助於他進入最高領導層，但他最終卻跌下神壇。

而那些可以被視為這一代人中的勝利者的領導人則有更普遍的經歷。如前所述，在政治局常委中，四位「文革一代」的成員都當過知青。

1953年出生的習近平是習仲勛的兒子，習仲勛本人也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習近平有七年上山下鄉的經歷。當他於1969年1月到陝北延川地區一個貧窮村莊插隊落戶時，年僅十五歲。由於他的父親早在文革之前就已經受到毛澤東的大清洗，他本人也受到排擠。對年幼的習來說，知青生活在一開始就非常艱難，以致他在沒有得到批准的情況下偷偷跑回北京。但後來他的一位家族成員成功勸說他重返陝西，並設法適應了當地的生活，他在二十歲時成為所在生產大隊的黨支部書記。顯然，決心加機遇可以解釋習的成功。所謂決心是指，為了入黨，習曾寫過十份申請書，但都遭拒，最終才獲得批准。所謂機遇是指，負責管理知青的當地幹部很欣賞習。這位幹部焚燒了習的黑檔案，並說服上級主管部門，稱知青能夠避免牽涉於當地宗族間的長期衝突。在一篇自述插隊經歷的文章中，習也承認，由於其父在共產革命時期曾是這一地區的主要領導人，這一點也對他有所幫助。當地一些幹部正是出於這一原因才保護了他<sup>⑩</sup>。

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想要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一個正常的制度途徑便是通過共青團體系往上爬。在「正統一代」中，胡錦濤便是通過此路走向成功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在「文革一代」中，最突出的例子便是李克強。

作為一名幹部，習近平參加了很多幫助改善當地生產生活條件的活動。不過，他仍然夢想能夠上大學。1975年他終於獲得上大學的機會，以工農兵學員的身份進入清華大學化工系深造。這還多虧了其父下放勞動的工廠所寫的一封信。信中說，習仲勛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此後習仲勛被平反。習近平大學畢業後，先是在1979年成為國務院辦公廳的一名秘書，後任中央軍委辦公廳秘書。自1982年起，他開始在河北、福建、浙江以及上海(短期)擔任區、市和省一級領導，最終於2007年直接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外，從1998至2002年，他通過了清華大學在職研究生班學習，獲得了法學博士學位。

如果說中共一把手是一個太子黨成員，那麼中共的二號人物則是共青團派系的成員。這代表了最高領導層內部力量的相對平衡。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想要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一個正常的制度途徑便是通過共青團體系往上爬。在「正統一代」中，胡錦濤便是通過此路走向成功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在「文革一代」中，最突出的例子便是1955年出生的李克強。1974年，作為知青的李到其老家安徽的一個村莊插隊，兩年後入黨，並在1977年成為所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作為知青在插隊當地獲得政治提拔是比較罕見的事情(習近平在插隊期間也獲得了提拔)。如果說李不算是中國政治精英特權階層的一員(其父只是一個地方幹部)，那麼他父親的一位朋友對他進行的非常嚴格的教育則令他受益匪淺。自文革開始以後，在中國教育體系支離破碎的情況下，他父親的這位朋友便將李收為弟子，讓他透徹了解了中國文學和歷史的相關知識。這大概就是李在1977年能夠通過高考並在1978年成為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生的原因。他是一個聰明的學生，對有關法律和政治的相對「自由」的理念最感興趣；作為學校學生會負責人和團委幹部，他也非常活躍。1982年大學畢業後，他本可以赴美留學，但最終

被說服接受北大團委書記一職<sup>⑩</sup>。此後，他沿着共青團系統的階梯一步一步往上爬，並在1993年成為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從1998年起，他先後出任河南、遼寧兩省的省委書記。2007年直接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有過知青經歷的高層領導中，習近平和李克強都曾發表或允許第三方發表有關其上山下鄉經歷的文章。當然，這些文章展現的是兩人的農村插隊經歷如何鑄造他們的性格以及他們同基層民眾的聯繫，目的是為了增加兩人的政治資本。這些文章都很有趣，尤其是習親自撰寫的那篇文章更是充滿了個人感慨。但同樣有過知青經歷的「文革一代」另一位成員王岐山，卻從未發表過有關其這段經歷的任何文章（至少據筆者所知是如此）。這可能是因為這段經歷甚具傳奇性。

出生於1948年的王岐山可謂是一個「駙馬爺」。他在延安農村插隊的兩年顯然改變了他的命運。和童話故事中牧羊女在農村遇見了王子成為王妃的故事類似，知識份子家庭出身的王遇見了一位「公主」（中共高層領導人姚依林的長女姚明珊），兩人墜入愛河，王也因此成了太子黨。王岐山在農村的插隊生活對其個人命運有着決定性影響。王能在1973年成為工農兵學員並在西北大學歷史系學習，恐怕和他的岳父也在當時得到平反並被任命為對外經貿部副部長有關。但還有一個未解之謎是，王為何能在僅僅插隊兩年之後的1971年就獲得了陝西省博物館的工作。1976年大學畢業之後，他重回陝西省博物館工作。1979年，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本該學習近代歷史，但此時他的興趣已轉移至宏觀經濟和政治。因此，在1982年離開社科院之後，他進入政府最高智庫，隨後又進入銀行系統工作。從1997年起，王在廣東、海南和北京開始了省部級領導的官場生涯。2007年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2008年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

在「文革一代」中，另一個冉冉升起的新星是1946年出生的張德江。在中共十八大上，張德江成為排名第三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此人的適應能力特別強。1968年，他從長春的一所高中到吉林農村插隊。1970年，當了不到兩年知青的張成了當地的一名幹部。之後他成了延邊大學朝鮮語專業的一名工農兵學員。畢業後，他被提拔為延邊大學的高級幹部。他的好運似乎是因為得到當地一位朝鮮族幹部李德洙的賞識。在張順着官方階梯晉升的同時，李成了他的導師，拉了他一把<sup>⑪</sup>。1978年，張被送往平壤，在朝鮮金日成綜合大學學習經濟學。可能由於他的專業對發展改革開放中的中國經濟不是非常有幫助，他又回到延邊大學擔任副校長。他從1983年開始自己的政治生涯，從市一級領導一路升到省級最高領導（1995年出任吉林省委書記，1998年出任浙江省委書記）。似乎是從1990年起，他又追隨了一個權力更大的導師：江澤民。2002年，他出任廣東省委書記並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從2007年開始，他重回北京，到中央工作。但在2012年3月，由於薄熙來下台後急需找到重慶市委書記的替選人選，張被派往重慶。縱觀其整個政治生涯，張似乎展現出一種高超的技巧，總是能適應上級領導的要求，並展示出自己的忠誠。

從2007年開始，張德江重回北京，到中央工作。但在2012年3月，由於薄熙來下台後急需找到重慶市委書記的替選人選，張被派往重慶。縱觀其整個政治生涯，張似乎展現出一種高超的技巧，總是能適應上級領導的要求，並展示出自己的忠誠。



## 六 對「文革一代」領導人的期望

「文革一代」領導人或多或少都曾有過作為普通人在基層生活工作的類似經歷，尤其是在農村。他們因此對普通人遭遇的種種困難可能會有更多理解和同情。他們或多或少也都曾對毛式社會主義的現實大失所望，而林彪外逃以及1970年代毛澤東執政末期的險惡氣氛也都令他們深受衝擊。在毛執政末期，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和空洞的口號隱藏了中共最高層內部激烈的政治鬥爭。和「文革一代」的普通人一樣，他們肯定已經意識到空洞的口號是無用的，甚至是危險的。這會令他們更加務實，不那麼信奉教條。

但是，從這些領導人的履歷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非常獨特的地方。當今中國排在前三位的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和張德江在農村時就已經成為基層政治幹部，這是相當罕見的。此外，王岐山的經歷也非常不典型：他上山下鄉的經歷反倒幫助他成為太子黨。這就是筆者不認為這些領導人可以代表整整「文革一代」的原因。

「文革一代」在人生成長期都曾經歷過重大事件，他們在藝術、文學和社會科學等領域都形成了顯著的個性，同時對代際歸屬都有強烈的意識。他們中的很多人頗具創造性和創新性，往往展現出一種批判精神，這甚至讓其中的一部分人成為政治上的異見人士。但是，那些成為政治精英的「文革一代」則有卓越的適應能力和取悅上級的本事。另一方面，1970年代末進入大學學習的那批人在當時確實可能受到那個時期自由和開放氛圍的影響，這一點在李克強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他承認自己的導師之一龔祥瑞對他的影響。龔祥瑞是一位法學專家，崇尚英國憲政傳統<sup>①</sup>。在民主牆運動期間，李同年輕的民主活動人士也有聯繫<sup>②</sup>。

但是在當今中國政治體制中，想要一邊順着權力的階梯往上爬，一邊保持非常開放和創新的思想是非常困難的。這一點在「團派」成員中體現得非常明顯。團派成員主要是黨內事務和宣傳工作方面的專家。他們經歷過中共的路線鬥爭造成的所有迂迴曲折，因為自己的忠誠和順從獲得緩慢但又是確定的提拔。至於說最高領導層內另一主要派系「太子黨」，他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熱衷於保護這一政權的利益。從另一方面看，他們的出身可以給他們足夠的信心去試圖尋找新的途徑來保護這些利益，這可能會導致他們進行有限的改革。

## 七 新的領導風格，但影響又有幾何？

儘管「文革一代」的政治精英具有的特點並不必然有利於他們在政壇實行創新和開拓，不過，可以明確的一點是，他們在成長期的經歷和胡錦濤、溫家寶那代正統領導人存在很大的不同，這至少會體現在他們的執政風格上。這種差異在習近平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開展工作的幾個月內已經有所體現。當然，曼海姆所說的「一代人的新風格」<sup>③</sup>不僅僅意味着領導人在公開場合露面時不再那

當今中國排在前三位的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和張德江在農村時就已經成為基層政治幹部，這是相當罕見的。此外，王岐山的經歷也非常不典型：他上山下鄉的經歷反倒幫助他成為太子黨。這就是筆者不認為這些領導人可以代表整整「文革一代」的原因。

麼拘束，以及要求政府官員在公務宴請時應厲行節約那麼簡單。仍然有待觀察的是，新一屆政府是否會進行結構性改革，這有助於縮小巨大的貧富差距，或落實目前僅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予以認可的公民權利。

與政治和經濟精英的利益所佔的巨大權重相比，代際因素的份量似乎很輕，輕到以至於想憑此實現突破非常困難。換句話說，在決定國家命運時（至少是領導人的政策時），階級因素所擁有的份量應該重於代際因素。現實情況往往是這樣。不過，筆者仍然認為不應該忽視代際因素，因為歷史的演變始終是複雜的，一些看似不太重要的因素實際上可以產生決定性影響。代際因素可以對一個國家應對危機和突發事件的方式產生一定影響。比如人們可以想像，如果鄧小平在1989年已經去世，中國又會發生甚麼。鄧自己曾強調過下列事實的歷史重要性，即1989年幸好「老同志」還健在<sup>②</sup>。事實上，從毛澤東、鄧小平，再到所有這些「老同志」，同一代人從1949至1992年整整統治中國四十三年。1992年，年近八十八歲高齡的鄧小平又通過其著名的「南巡」<sup>③</sup>施加其對中國政治的最後一次重大影響。這一「人參因素」<sup>④</sup>對中國政治制度改革的制約不應該被遺忘。

由於高層領導定期換屆已經成為一種制度，那麼任何一個領導人的一時之念就不會對國家政治產生太大影響。每一屆新的領導集體都可以帶來「新的領導風格」，即使整個體制在設計之初是為了選擇「可信賴的接班人」。只有在新的挑戰需要全新應對方式的情況下，這種新的風格才會產生一點差別。但是，由於過去十年結構性改革始終遭到系統性抵制，因此在並不遙遠的將來，這樣的挑戰很有可能出現。

吳曉龍 譯、潘鳴嘯 校

在決定國家命運時，階級因素所擁有的份量應該重於代際因素。不過，筆者仍然認為不應該忽視代際因素，因為歷史的演變始終是複雜的，一些看似不太重要的因素實際上可以產生決定性影響。代際因素可以對一個國家應對危機和突發事件的方式產生一定影響。

## 註釋

① Michel Bonnin, "The 'Lost Generation': Its Definition and Its Role in Today's Chinese Elite Politics", *Social Research* 73, no. 1 (2006): 245-74.

② Cheng Li, *China's Leaders: The New Generation* (Lanham, MD: Row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③ 參見潘鳴嘯 (Michel Bonnin) 著，歐陽因譯：《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第14章。該書簡體字版由北京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於2010年出版。

④ 簡略地講，要分辨社會科學用的「代際」與人口學用的「同齡層群」這兩個概念，不能以十年或五年分組，因主要因素不是客觀的而是主觀的，不是出生年份，而是在性格形成時期共同的經歷和感受。所以代際以歷史背景，特別是影響人的生活和思想的歷史大事為基礎。

⑤ 該文在1928年首次在德國一份社會學季刊 (*Kölner Vierteljahrshefte für Soziologie*) 發表。曼海姆去世後文章被翻譯成英文，參見Karl Mannheim,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in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d. Paul Kecskemeti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2), 276-322。

⑥ 這一年留在農村的知青數量幾乎有900萬。從1968至1977年，總計約有1,600萬知青上山下鄉。參見潘鳴嘯：《失落的一代》，頁170，圖表1與2。

- ⑦ 參見Tani E. Barlow and Donald M. Lowe, *Teaching China's Lost Generation: Foreign Experts in the PRC* (San Francisco: China Books & Periodicals, 1987)。
- ⑧ 當時，絕大多數城市的高中教育已經普及，但中小學教育的總年限被壓縮至十年。參見Jonathan Unger, *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 1960-198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154。
- ⑨ Irving Rosow, "What is a Cohort and Why?", *Human Development* 21, no. 2 (1978): 69.
- ⑩ 指1966、1967和1968年這三年的初中和高中畢業生。
- ⑪ 鄧小平的講話參見Andrew J. Nathan and Perry Link, eds., *The Tiananmen Papers* (London: Little, Brown & Co, 2001), 426-30.
- ⑫ 在李成看來，第四代領導人是源自「文革一代」的政治精英的統稱。參見Cheng Li, *China's Leaders*, 12。
- ⑬ 第三代領導集體中的唯一例外是李嵐清。他畢業於復旦大學企業管理系。
- ⑭ 李源潮、趙樂際以及來自軍隊的兩名政治局委員之一范長龍。范長龍只當過一年知青，1969年便應徵入伍。應該指出的是，在當時能夠參軍是最好的出路。通常只有階級成份很好的人才能參軍。這些人往往是軍隊幹部的子女，退伍之後他們往往能獲得進一步提拔。
- ⑮ 參見〈新一屆中央委員65人具有知青經歷(全文)〉(2012年11月22日)，網易新聞，[http://news.163.com/12/1122/13/8GTT048N00014JB6\\_all.html](http://news.163.com/12/1122/13/8GTT048N00014JB6_all.html)。
- ⑯ 習近平、李克強和張德江。另一位曾經當過知青的王岐山排名第六位。
- ⑰ 薄熙來在1968年入獄的原因仍然不清楚，對此存在多種解釋。有人說是因為他參加了紅衛兵暴力事件，有的說是因為他偷了東西被發現。無論如何，如果不是他父親當時有政治問題，他就不會坐五年牢。
- ⑱ 參見習近平：〈我是黃土地的兒子〉，<http://maomaotou.blog.163.com/blog/static/175223656201182491554136/>。
- ⑲ 據筆者所知，李克強不曾寫過類似習近平那樣回憶青年時代的文章。但新華網發表的文章中顯然包括很多由他本人提供的細節信息。參見〈新華網：李克強同志的知青歲月〉(2011年10月11日)，河北新聞網，[http://lishi.hebnews.cn/2011-10/11/content\\_2309470\\_3.htm](http://lishi.hebnews.cn/2011-10/11/content_2309470_3.htm)。
- ⑳ 參見賈玉民：《第五代中共十八大主角》(紐約：明鏡出版社，2010)，頁163-93。
- ㉑ 參見〈新華網：李克強同志的知青歲月〉。
- ㉒ 這是從《北京之春》兩位前成員那裏得知的信息。《北京之春》是1970年代末在地下出版的一本雜誌。
- ㉓ Karl Mannheim,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309.
- ㉔ 參見1989年6月9日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23/content\\_2608913.htm](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23/content_2608913.htm)。
- ㉕ 傅士卓 (Joseph Fewsmith) 強調了這一點。參見Joseph Fewsmith, "Generational Transition in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5, no. 4 (2002):27。此外，傅士卓和筆者的看法一樣，即認為所謂第四代領導集體實際包括兩代人(頁25)。
- ㉖ 參見Susan L. Shirk, "The Delaye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Leadership Politics", in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From Mao to Jiang*, ed. Jonathan Unger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2), 302。傳統上講，人參可以延年益壽。服用人參可以解釋在1980年代仍然活躍的中國老一代領導人尤為長壽的原因。

潘鳴嘯 (Michel Bonnin)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中法研究中心主任。